

# 《人民日报》视野中的楼适夷

——以“十七年”时期为考察中心

李秀卿<sup>1,2</sup>, 曾国全<sup>2</sup>

(1.华东师范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241;2.西昌学院 文教学院,四川 西昌 615000)

**【摘要】**考察“十七年”时期《人民日报》中的楼适夷,可以发现他从“忘我”到“无我”的一次精神蜕变。这种蜕变的实质是“自我”的逐渐淡忘直至完全丧失,意味着“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在个人身上的彻底刈除,这是文艺界思想改造运动的必然结果。问题在于,“自我”的丧失导致随后的盲目服从和狂热“紧跟”,其结果必然是遭受愚弄和摆布。

**【关键词】**《人民日报》;楼适夷;自我;蜕变;愚弄;摆布

**【中图分类号】**K8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1)04-0021-03

建国以后,大概有十年时间,楼适夷一直处在身心愉悦的状态当中。尽管工作繁忙,但无怨无悔、任劳任怨。就是在遭受痛失爱子这样重大的打击下,他也没有倒下。参加文艺座谈会、亲赴抗美援朝前线采访、领导出版工作、参与对外文化交流……可以说文艺界四处活跃着他忙碌的身影。然而,随着政治形势的急剧变化,他逐渐迷失“自我”,变得不会独立思考。他的这一悲剧性转变,是当时整整一代知识分子的缩影。现在回顾,仍感沉重。作为党报,《人民日报》中有关楼适夷的报道和文章,清晰地勾勒出了楼适夷的这种精神蜕变的轨迹。

## 一

建国初期,楼适夷异常繁忙。他的行政身份是新闻出版署通俗读物处副处长,但社会兼职很多:作协理事、作协外委会副主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理事,朝鲜战争爆发后,又变为志愿军东北军区后勤部宣传部长,曾三上前线,冒着暴风雪到达长津湖战役主战场柳潭里一带实地考察,写出了《战地司机》和《朝鲜人》等通讯<sup>[1]</sup>。复员后,出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等等。工作之杂,活动之多,仅从《人民日报》的报道中就可见一斑。大至“鲁迅逝世十三周年”纪念晚会<sup>[2]</sup>,小至首都文艺界电影座谈会<sup>[3]</sup>,忙得连儿子死于医疗事故也无暇顾及<sup>[4]</sup>。痛失爱子这样重大的变故,不可能不对他造成巨大的悲痛,但他仍然坚持工作,丝毫没有懈怠,表现出对新中国无限的热爱和对文化建设事业的满腔热情。

楼适夷可谓忙碌,但他高兴。新中国的建立,从青年时代就为之奋斗的理想终于变成现实,其兴奋激动之情是可想而知的。他把这种激情转化为

工作上的无穷动力,整天忙碌奔波、任劳任怨,几乎达到“忘我”的程度。从他工作岗位的几经变换可以看出,他对个人名利地位毫不在意,一切工作服从组织安排。当需要他为文艺出版工作服务时,他就留在出版总署;当需要他为抗美援朝宣传出力时,他又成志愿军东北军区后勤部的宣传部长;一复原,他又成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副社长领导全社业务工作。他乐于接受上级安排的各项任务。实际上,他不像领导,更像一位做具体事务的文艺工作者。从三十年代跟着鲁迅、茅盾编刊物起,一直到晚年,他始终扮演着“跑腿的”、“灶下婢”这样的角色。1993年9月29日在给黄源的信中他还说:“今日思之,有愧‘作家’称号,既无所作,更不成家,惟一生为文学服务,靠文学吃饭,拟自评职称为‘文学工作者’耳”<sup>[5]</sup>。这是他的自我定位,也是一种自觉追求。在“忘我”的表象之下他有着清醒的“自我”意识。

除了担负行政职务,楼适夷还参加各种对外文化交流活动。1954年11月至次年1月访问印度和缅甸,楼适夷作为代表团的秘书长,负责管理团里的日常工作。他不仅把团务打理得井井有条,而且和艺术家“犹如一家人,亲密无间”,“丝毫没有著名左联老作家和出版社的社长架子”,受到艺术家们的赞赏<sup>[6]</sup>。和郑振铎、周而复、李少春等人受到印度副总统、缅甸总统的专门接见<sup>[7]</sup>。《人民日报》12月31日第四版的报道有这样一段话:“欢迎的人群中走出一位妇女,端着一盘灯火来到楼适夷秘书长面前,用大拇指蘸了朱砂在他的眉际上一抹。招待中国文化代表团的高尔准将解释说,这是印度民族最尊贵的民族仪式,是母亲、姐妹为亲人出征或远行而祝福的仪式。”可见他们所受的礼遇。回国后,楼

收稿日期:2011-09-23

作者简介:李秀卿(1971- ),男,四川乐山人,副教授,在读博士,研究方向:日本文学及中日文学比较。

适夷还为出访的专题纪录片撰写了解说词。

“反右”前后,楼适夷受到冲击。1959年以后,才重新复出,频繁参加欢迎外国文化代表团的各类宴会。<sup>[8]</sup>所以说,1949年到1959年这十年间,参加对外文化交流活动成为楼适夷一项十分重要的政治任务。特别是在接待来访的日本文化团体活动中,几乎次次都有楼适夷,可谓频频出镜。这当然源于他中国作协外国文学委员会副主任这一身份,以及日本文学翻译家的身份。但要注意,《人民日报》的报道中,从未标示过“外委会副主任”这样一个官方身份,反而是诸如“作家”、“文化界人士”、“文化艺术界人士”、“诗人”这样的民间人士身份,或者干脆不表露身份。这种模糊身份体现出的某种微妙变化颇耐人寻味。

作为对外文化交流的另一种形式,楼适夷还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不忘拿笔杆的老本行,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给匈牙利的一位姑娘》、《写给莫斯科来的一位同志》等文学作品,翻译了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的诗作,两度撰文纪念日本著名作家小林多喜二,称赞他是“日本最优秀的无产阶级作家,是日本人民的优秀的儿子,同时,他也是中国人民革命运动中,中国革命文学运动中的亲密的朋友”<sup>[9]</sup>。这些都反映出他饱满的热情和良好的精神状态。

## 二

进入五十年代后期,中国社会受“极左”政治思潮的干扰日益严重,社会经济发展急速偏离正常轨道,差点给新中国造成灭顶之灾。文艺界首当其冲,成为这场噩梦的“重灾区”,知识分子受到严重冲击。在文艺界掀起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本身,其初衷就是要彻底刘除这批知识分子身上强烈的“自我意识”,“恨斗‘私’字一闪念”,把他们规整到党的文艺政策上来。在当时的语境中,“自我意识”无疑是“自由主义”的同义语,与主流意识形态完全相悖,两者被视如水火,“个体”显然没有生存的土壤和空气。受此空间的强力挤压,楼适夷经历了由“忘我”向“无我”,最终到丧失“自我”的精神蜕变。于是,最初的无声抵抗逐渐走向屈服妥协、盲目服从,乃至最后狂热“紧跟”,最终成为受人摆布和愚弄的对象。在这场貌似严肃的荒唐闹剧中,知识分子显出的天真与幼稚,至今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楼适夷无法不卷入其中,虽然对自身冲击不大,但敲山震虎,从此不得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楼适夷长期经历了残酷的革命斗争的洗礼,甚至经受了敌人牢狱的考验,但在五六十年代这场癫狂的政治风云面前,他仍然显

得笨拙和傻气。应该说,楼适夷并没有一开始就顺风转向,他也作过无声的“抵抗”。但是,这种抵抗在强大的政治攻势下,显得如此微弱,很快就土崩瓦解了。在各式各样所谓“揭批”中,出于本能的“尽快脱身”的天真考虑,他不得不说了或写了一些揭露批判别人的言论。这些言论有多少是事实、多少是言不由衷的被迫附和,我们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楼适夷的发言是有底线的,绝不会“乱咬”。象批萧乾,对他来说,萧乾应该是属于那种交往不多、比较陌生的一类。《人民日报》的报到中明确提到了曹禺、陈笑雨、陈白尘、梅韬如何如何说,而楼适夷只是笼统地一带而过。看来他并没有“揭露出”多少“新的”、“惊人的”、“有杀伤力”的材料。<sup>[10]</sup>

对冯雪峰和胡风,他承认在这两位好友落难时他是“扔过石头”的。批冯雪峰时,楼适夷在前十一次的会议中是一直保持了沉默的,到第十二次以后,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表态,看来不发言实在不行了,这才不得不表态。众所周知,这次会上楼适夷的“一哭”客观上确实也增强了会场的紧张气氛,多少使冯雪峰的处境更为艰难。但仔细考察,楼适夷也只是“三言两语,就下场了”<sup>[11]</sup>,并没有“落井下石”的只言片语,这和夏衍的所谓“爆炸性”发言显然有本质区别。楼适夷这一“头脑发热”的“大哭”,让他长期背负了沉重的良心十字架。毕竟,冯雪峰并非一般人,他可以说是楼适夷踏上革命道路的引导者,他们在三十年代并肩作战,可谓情同手足。会后一冷静,楼适夷就愧疚难当,成为他的一个心结。当1980年夏衍再次重弹五七年老调,血污冯雪峰时,他拍案而起,秉笔直书,为冯雪峰申冤鸣屈。在他晚年为老友所写的怀念文章中,除了鲁迅,冯雪峰和胡风的悼文是最为情真意切的,这里面包含了他为自己的过失赎罪的心情。

在整个社会日益癫狂的背景下,楼适夷只能丢弃“自我”,紧跟形势,努力使自己不掉队不落伍。他人云亦云,写《咏大字报》这样的赞诗,他满腔豪情参加“大炼钢铁”,他抗议美国政府疯狂迫害美国共产党、支持“古巴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保卫古巴主权和独立”的示威游行<sup>[12]</sup>、写支持非洲独立的诗<sup>[13]</sup>……在那个丧失理智的狂热年代,楼适夷也和全国人民一样,裹挟在高度亢奋的非理性洪流中,步步“紧跟”,唯恐掉队落伍。然而,这场荒唐闹剧的性质早就决定了楼适夷不管多努力,不管多“紧跟”,最终只能被抛入深渊,成为政治贱民。果然,“文革”十年,楼适夷遑论领导、翻译、创作,就连揭批、狂热的资格也都统统被剥夺。十多年间,批斗、

关“牛棚”、下“干校”、“靠边”……以六七十岁的高龄和病弱之躯遭受了难以言说的苦痛,一直到这场“噩梦”终结。这场灾难成为新时期以后楼适夷“人格”重建的重要经历。

### 三

“十七年”时期,楼适夷从“忘我”到“无我”的精神蜕变,是那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缩影。换言之,分析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精神史,楼适夷无疑是一个典型个案。他的遭遇是大陆知识分子集体命运的写照。楼适夷的命运反映出在政治意识形态的强烈

干预下,文艺知识分子内心所遭受的巨大创伤,乃至扭曲和变形,说明在处理党的领导和文艺关系时,不能动用政治权利强行规整。人文知识分子作为社会公众的“良知”,必须赋予其应有的独立自主性。另一方面,也警醒知识分子,任何时候,“自我”的淡忘乃至丧失,都意味着“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彻底刘除,“无我”必然导致盲从和狂热、幼稚和天真,从而遭受愚弄和摆布。保持“人格”独立,不作任何附庸,是人文知识分子所扮演的社会角色使然,是人文知识分子安身立命之所在。

####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人民日报[N].1951/2/25 V.
- [2]人民日报[N].1949/10/19 I.
- [3]人民日报[N].1950/4/1、1950/11/9Ⅲ;1961/3/14Ⅳ.
- [4]人民日报[N].1950/7/5、8/3Ⅳ,8/10/25Ⅲ.
- [5]巴一熔,黄炜编.黄源楼适夷通信集(下)[M].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446.
- [6]周而复.生无所息——怀念适夷同志[A].上海鲁迅纪念馆、人民文学出版社编.楼适夷同志纪念集[C].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55.
- [7]人民日报[N].1954/11/23 I、12/9、12/31Ⅳ.
- [8]人民日报[N].1959/5/27Ⅵ、6/9Ⅳ、10/18Ⅱ;1960/6/6Ⅳ、6/8Ⅵ、7/30Ⅵ、8/13Ⅵ;1961/3/14Ⅳ、7/3Ⅱ、10/6Ⅴ;1963/9/30Ⅲ.
- [9]人民日报[N].1958/2/20Ⅳ.
- [10]人民日报[N].1957/8/17 I.
- [11]楼适夷.为了忘却为了团结[A].话雨录[C].三联书店,1984:90-92.
- [12]人民日报[N].1958/3/31Ⅷ;10/24Ⅲ;1962/1/23Ⅳ、11/6 I.
- [13]人民日报[N].1964/4/13Ⅵ.

## Lou Shi-yi in the visual field of People's Daily

——During “17 years” Period

LI Xiu-qing<sup>1,2</sup>, ZENG Guo-quan<sup>2</sup>

(1.College of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2.Xichang College, Xichang, Sichuan 615000)

**Abstract:** Investigating Lou Shi-yi at "17 years" period in the People's Daily, we can find out that there was a spiritual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selflessness" to "self-effaceable" with Lou Shi-yi. The essence of this transformation completely lost the "self", and it was to cut out "the independent of thought, the spirit of freedom". It was the thoroughly and the inevitable result of the ideological reform movement in literary and art circles. The question is that "self" loss caused subsequent blind obedience and fanaticism "follows", the result was inevitably subjected to deceived and fated.

**Key words:** People's Daily; Lou Shi-yi; Self; Transformation; Deceived; Fated

(责任编辑:张俊之)